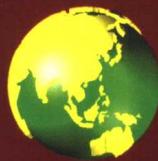


城乡 社会 保险制度

CHENGXUANG SHEHUI BAOGUAN ZHIBUY BINGGUI YANJIU



并轨研究

王飞跃 著

BINGGUI YANJIU



经济科学出版社

城乡社会保险制度并轨研究

王飞跃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周秀霞
责任校对：王肖楠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李长建

城乡社会保险制度并轨研究

王飞跃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三佳集团装订厂装订

880×1230 32 开 7.375 印张 190000 字

2004 年 9 月第一版 200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500 册

ISBN 7-5058-4346-X/F · 3618 定价：1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30



王飞跃，1960年3月11日出生于贵州省毕节县。1986年毕业于贵州财经学院财政专业，并留校任教至今。1986年9月至1987年7月在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系研修保险学专业，1997年9月至1998年7月在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系，从事国际保险监管比较研究，2000年9月至2001年7月在加拿大麦吉尔（McGILL）大学做访问学者，从事农业保险及财政金融政策研究。2001年被聘为保险学教授。出版《风险、保险及社会经济分析》、《社会保险制度分析》、《保险学》、《财政与金融》和《社会保险学》等著作，在省级以上专业刊物发表专业论文20余篇。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乡社会保险制度并轨研究/王飞跃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9

ISBN 7 - 5058 - 4346 - X

I . 城… II . 王… III . 城镇 - 社会保险 - 制度 - 研究 - 中国 IV . F842. 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0302 号

前　　言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之时，迈入了新的世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及市场经济建设自身的客观要求，使得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成为实现中国社会稳定、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重大课题之一。特别是中国西部较不发达的多民族地区，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情况下，在现有物质基础之上，如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保险制度，这对西部地区社会经济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基础，并以此促进当地经济在不断的调整中得以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在以往对西部地区社会保险制度研究的基础上，为了更为系统和深入地开展研究，课题组以《贵州城乡社会保险制度并轨之研究》为题，申请贵州哲学社会科学 2002 年度课题，并获立项，同时也成为贵州财经学院金融重点学科建设资助项目，使本课题研究的顺利开展有了可靠保证。

本课题研究的内容集中体现为：第一部分，社会保险的理论渊源与实践分析。主要分析社会保险的理论形成和市场化国家实践的经验与教训。第二部分，贵州社会经济与社会保险制度分析。主要分析贵州社会经济发展所具备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在实地调查后，认为社会保险制度在西部较不发达地区的建立，在现有物质基础条件下，成本最低，机会最佳。第三部分，贵州城乡社会保险制度并轨。就如何建立农村“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社会保险模式进行了探讨，特别是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按市、

县、乡分类编制了贵州省城乡人口生命表（包括性别生命表），为将来人口与社会以及经济发展的科学决策奠定了基础。

为了做好课题的研究，在课题开展研究之际，课题组邀请了贵州财经学院徐国柱教授、张晓阳教授、陈森良教授等有关专家，以及贵州省社会保险局岑延平书记和有关业务部门的同志，进行了开题论证。就课题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以及应注意的事项，征询了专家们和实际部门的宝贵意见，确保了课题在较高水平上得以顺利完成，在此表示真诚的感谢。

同时我们还要感谢为本课题实地调查提供全力支持的贵州省贞丰县、三穗县政府以及所辖的有关乡（镇）政府，特别是三穗县款场乡卫生院的热情支持与参与。

需要说明的是，课题组成员白万平副教授因公前往美国学习，其承担的任务由曾经参与《贵州省人口地图集》编辑工作的朱晓铭讲师负责，但他仍然时时关心本课题的研究，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贵州城乡社会保险制度并轨之研究》课题组课题主持人

王飞跃

2004年7月于贵阳

目 录

第一章 社会保险的理论渊源与实践分析	(1)
第一节 社会保险的理论渊源	(1)
第二节 社会保险的实践分析	(45)
第三节 社会保险与相关范畴	(73)
本章小结	(85)
第二章 贵州社会经济与社会保险制度分析	(87)
第一节 贵州社会经济现状分析	(87)
第二节 贵州社会经济状况的水平分析	(93)
第三节 贵州现有社会保险制度分析	(118)
本章小结	(161)
第三章 贵州城乡社会保险制度并轨	(164)
第一节 社会保险制度并轨的数理基础	(164)
第二节 医疗社会保险费的测算	(196)
第三节 城乡社会保险并轨机制的建立	(205)
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	(213)
后记	(228)

第一章 社会保险的理论渊源 与实践分析

第一节 社会保险的理论渊源

社会保险理论渊源，学理界目前比较统一的观点是源于人类历史上的空想社会论。空想社会论是基于对人类历史上存在的不合理、不公正的认识，由一些思想家提出的人类社会的理想模式。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空想”只能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结构形态。但正是有了这样的“空想”，才使人类为之不断奋斗和探索，进而促进了人类社会和文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最终也由此产生了现代社会保险理论。

一、空想社会理论的形成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 427 年～公元前 347 年）的《理想国》被认为是最早和最具有代表性的空想社会论。在《理想国》里，柏拉图认为：国家由统治者（有丰富知识与无穷智慧的哲学伟人）、执行统治者法令的“护卫者”、人民大众三个部分组成，实行财产公有，男女平等，统治者和护卫者廉洁奉公守法，意识形态上主张“正义”，即“不正义是人类最大的丑恶，正义是最大的美德”^①。柏拉图强调：“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哪一个阶级的单独

^① 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 62 页。

的突出的幸福，而是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①。柏拉图的《理想国》，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他主张公有制、社会正义、平等和协调的社会关系思想，使之成为最早的乌托邦思想，并对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发展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1561 年，英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出版了《乌托邦》（又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乌托邦”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没有的地方”，显然“乌托邦”即为一种空想。在莫尔的“乌托邦”里，要建立的是一种实行公有制、男女平等、按需分配社会产品、实施免费医疗和民主管理的一种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由于莫尔是处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他的“乌托邦”思想，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残酷剥削性、不公正性的揭露和反思。其后，虽然有 16 世纪德国伟大革命家和农民起义领袖闵采尔的“天国”思想和 16 到 17 世纪初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思想，以及 18 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梅叶、摩莱里、马布和巴贝夫等的空想社会论，使“空想”社会理论有了一些发展，但鼎盛时期则是 19 世纪，以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为代表，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②

圣西门在他的《论实业制度》和《实业家回答》两部著作中认为：社会制度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民主制度，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生产是按计划进行的，社会组织的目的是满足人们的需要，实行按劳分配。傅立叶在他的“和谐制度”思想中，将人类社会历程的 8 万年归结为 32 个时期，并就原始时期、蒙昧时期、宗法制度、野蛮制度、文明制度、保障制度、协作制度及和谐制度 8 个时期进行了阐述。欧文的“公社制度”是在设计的基础上付诸实践而不断改革和完善起来的，在他的“公社”里，领导机构是由社员大会选

① 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 13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81、283 页。

举的总理事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没有剥削、贫困和失业，公有制，机器与科学发明的广泛运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确保了人们的需要。对于此时期的这些空想思想，恩格斯曾经指出：空想社会主义者“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①“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②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在漫长的封建统治的不同时期也涌现出许多空想社会思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潮有：

儒家的空想社会理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提出了“大同社会思想”，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将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残疾人皆有所养。”近代改良主义者康有为受西方“平等、自由、博爱”思想的影响，结合孔子的“大同社会”思想撰写了《大同书》，提出了“去国界，和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行界，各独立；去众界，为天民；去产界，均业生；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确立了“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大同世界思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国，欧文曾实践其理想的“公社”，而在我国辛亥革命时期，吉林省安图县刘建树，受武昌起义的影响，在安图也举起义大旗，成立了“大同共和国”，并通电中外，宣布独立，试图将孔子的“大同社会”思想付诸实践，其结果不言而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66页。

道家学派的空想社会论。老子作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认为：“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以托天下”，但最能体现老子空想社会思想的是东晋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即“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粮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农民起义领袖的空想社会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为了反抗奴隶主和封建社会的残酷剥削和压榨，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农民起义，“均富、太平”的空想社会论便由此而产生。如东汉末年黄巾起义领袖张角，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以及“人人无贵贱，皆天之所生”的平等思想。北宋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李顺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拟通过起义建立起处处平等的美好社会制度。南宋农民起义领袖钟相，借助于宗教，成立了民间互助团体“乡社”，认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到了明清时期，这种“均富、太平”的空想社会论达到了高潮。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明确地提出了“均田免赋”、“除暴恤民，散财赈贫，发粟赈饥”、“扶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的思想。清末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宣布建立“太平天国”，认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主张“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处处平均”以及“丰荒相通”，并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天国”的理想社会。

从以上的简要介绍，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首先，不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原始积累时期，空想社会论的形成，无疑是对这些社会制度的批判和否定，也正是这样的批判和否定，促使人们不断地探索和追求人类社会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同时也促进了人类社会文明大进步和发展。

其次，人们的基本生活保障是社会稳定和文明的前提，只有丰

衣足食，人们才会安居乐业。这样的思想，促进了现代社会保险理论的产生和实践的发展。

第三，一种社会制度的实施与变革，不能超越其所处的历史时期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超越特定历史阶段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均富”，实为空想。现代社会保险理论的基础——公平与效率理论，便是立足于此。

最后，空想社会论，不仅是人类社会探索文明社会制度的宝贵思想财富，而且也萌芽并促进了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二、社会保险制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17世纪至18世纪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产业革命时期，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跃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矛盾和社会阶级矛盾也日益加深和激化，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缓和阶级矛盾，探索新的社会制度，由此产生了社会保险理论的基础——福利经济学。

（一）早期的福利经济思想

福利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的各种经济学说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

1. 亚当·斯密的福利经济思想。作为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亚当·斯密的福利经济思想体现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他认为，“需要靠劳动过活的人，其工资至少须足够维持其生活。在大多数场合，工资还得稍稍超过足够维护生活的程度，否则，劳动者就不能赡养家室而传宗接代了。”“劳动报酬的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反之，贫穷劳动者生活维持不足，是社会停滞不前的征候，而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乃是社会急速后退的征候”，“各种佣人、劳动者和职工，在任何的政治社会

中，都占大部分，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决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的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状态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而且，供给社会全体以衣食的人，在自身劳动生产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必要的衣食条件，才算是公正”^①。亚当·斯密的这些论述，表明他已经注意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建立在确保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之上的。

2. 威廉·汤普逊的福利经济思想。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者，欧文的信徒威廉·汤普逊（1775~1833年），为了宣传欧文主义，潜心研究和利用了大卫·李嘉图的经济理论，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为依据，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并初步论证了合作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他认为：“怎样调和平等和保障、公平分配和不断生产，本书的目的也就是要讨论这个问题，探讨它的后果，并指出用那些公正而温和的手段可以使分配的自然法则被普遍采用，可以使保障被公平地适用于一切人，而非独占地和伪善地仅仅适用于少数人，从而使它成为实现合理和健康的平等时最坚强的保证，而不致成为实现这种平等的永久障碍，因为唯有存在着保障才是不断再生产和财富积累的稳固基础”，同时“多数人的幸福优先于少数人的幸福，否则，我们所抱的目的，尽可能产生最大量的幸福，就要遭到牺牲”。他还认为“在发达的技术和优越的自然条件可以说是竞相造福于人的情况下，千百万劳动智慧的人民竟不能享受他们自己创造出的产品”^②，是因为他们作为劳动者缺乏保障，财富分配不平等所造成的。汤普逊通过建立“个人保障”和“社会保障”，实现财富公平分配的思想，对社会保险制度特别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国家分配实现社会基本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分析》，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62、63、72页。

^② 威廉·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8、44、129页。

保障制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3. 帕累托的“最大福利”理论。意大利庸俗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帕累托提出了“最大偏好状态”理论，即“最大福利”理论。他认为，“当某种分配标准为既定时，我们可以遵照这种标准，研究何种状态会使集体中各个人达到最大可能的福利。让我们考虑任何一个特定的状态，并且假定在适合所包括的关系方面作很小变动，如果这样做以后，每一人的福利都增进了，显然新的状态对每个人就更有利；相反，如果所有的人的福利都减少了，则新的状况对每个人就没有利。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这种小变动使一些人福利增进，而另一些人福利减少，那么对整个社会来说，就不能认为这种改变是有利的。”^①

（二）福利经济学的形成与完善

福利经济学的产生是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的发表为标志的。他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为原则，以马歇尔（英国“剑桥学派”的创始人，著名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均衡价格和消费剩余理论为依据，创立了完整的福利经济学说。基本内容包括：

1. 一个人的福利寓于他自己的满足之中，这种满足可以对财物的占有而产生，也可以由于其他原因（如知识、情感、欲望等）而产生，而全部福利则应包括所有这些满足。主张国家应当关心贫穷问题，应当致力于福利的增加。

2. “效用就意味着满足，一个人的经济福利就是由效用构成的”。如果一个人的欲望不变，他持有的一种商品越多，那么，他对于那种商品增加的单位所得到的效用就越少，因而他对于那种商品增加的单位所愿意支付的货币量（单位价格）也就越少。从一种商品最后增加的单位所取得的效用，叫边际效用；从商品的边际效用单位所得到的效用越来越少，被称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① 邓大松：《社会保险比较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页。

3. 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的联系表现在：首先，经济福利和国民收入两个概念是对等的，“对其中之一的内容的任何表述，就意味着对另一个内容的相应表述”。其次，国民收入是一国国民个人福利的总和，因此，国民收入总量越大，意味着国民福利或全社会的福利就越大。再次，要增加经济福利，就要增加国民收入，增加国民产品的数量，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第四，庇古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福利的因素：一是国民收入的大小，二是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情况。最后，任何引起国民收入份额变动的因素（如增加穷人的实际收入），如果并不同时引起国民收入量的减少或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的下降，都会增加经济福利。他还指出：“以下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即使或者使国民收入增加，而不减少穷人在其中占有的绝对份额，或者使穷人占有的绝对份额增加，而不减少国民收入，都一定会增加经济福利。”

4. 增加国民收入总量，有两条重要途径：一是实现生产资料最优配置，使生产资料在各个部门中的分配达到最佳状态。二是收入转移措施，即把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庇古的收入转移依据是：一个人收入越多，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越小；收入越少，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越大。至于收入转移的措施，他认为，有“自愿转移”和“强制转移”。前者是资本家自愿拿出一部分剩余价值举办娱乐、教育、保健等福利事业。后者则是国家通过征收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把集中的一部分国民收入再补偿给穷人。对于强制转移的方法，庇古认为可以采取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关于直接转移，他认为，是以举办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设施的办法，向穷人支付养老金、失业补助金、医疗费、教育费和住房补贴等，直接增加穷人的实际所得。间接转移，就是对穷人迫切需要的日常用品生产部门和服务单位，政府给予补贴，促使这些部门和单位降低商品成本或服务价格，使穷人受益。^①

^① 邓大松：《社会保险比较论》，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41 ~ 142 页。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变革，庇古的社会福利模式，即“个人福利的总和与国民收入的总量越大，全社会福利就越大”，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效用序数论”、“边际替代率”、“无差异曲线”和“消费可能线”等分析方法，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但推动和发展庇古福利经济学，并对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凯恩斯和贝弗里奇的理论。

凯恩斯是“一个最初信奉萨伊定律，歌颂自由放任的自由资本主义，然后转向倡导政府干预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①他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出笼，就引起了经济学界的轰动，并被誉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认为：增税、大量非生产性支出、经常性赤字是保证劳动者“充分就业”，形成“福利”国家的基础。他的经济理论曾是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社会公共政策和建立福利国家的重要理论依据，并对大危机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世界经济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普遍建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英国伦敦大学教授贝弗里奇，1941年受英国政府委托，负责起草了题为《社会保险及有关服务》的报告。该报告一出台，就引起英国及整个欧洲大陆的震动和政府的关注，被称为“贝弗里奇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利国家”基本上是按该报告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该报告的要点有：

第一，贫穷、疾病、愚昧无知、肮脏和懒惰，是影响国民生活、阻碍社会发展的五大社会病毒，政府有责任，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强制社会保险与自愿保险，消除这些滋生社会病的毒菌，使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相互配套，成为完整的、统一的全民保险制度，以此实现充分就业，振兴国家经济。

第二，提出了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和普遍性原则及其保障

^① 刘涤源：《货币论》中译本序言，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页。